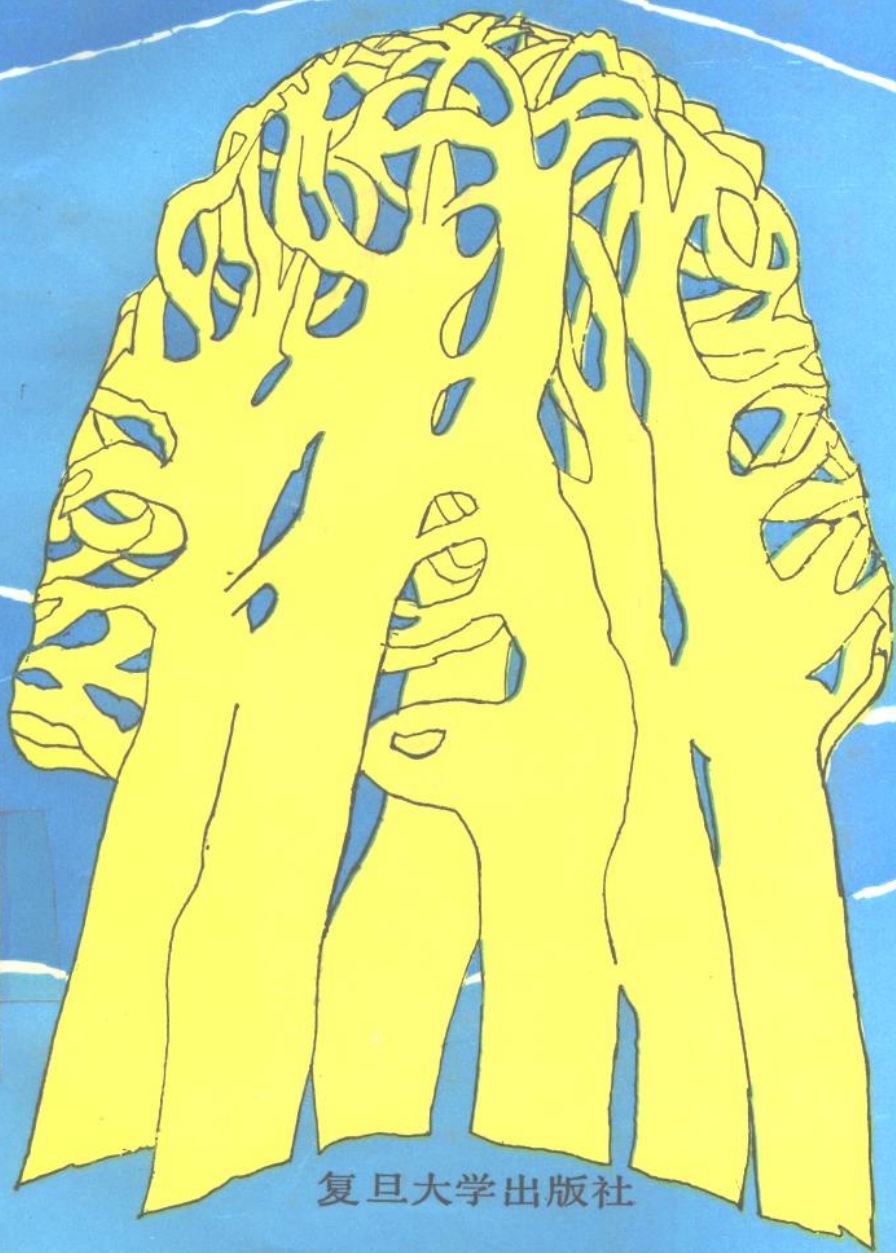


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

贾植芳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

贾植芳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

责任编辑 杜荣根
责任校对 陆宏光
封面设计 孙 曙

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

贾植芳 主编

复旦大学出版社出版

(上海国权路 579 号)

新华书店上海发行所发行 复旦大学印刷厂印刷

开本 850×1168 1/32 印张 9.25 字数 232,000

1990 年 2 月第 1 版 1990 年 2 月第 1 次印刷

印数 1-3,000

ISBN7-309-00262-8/I·22

定价: 4.80 元

序言：博采众花 以酿己蜜

贾植芳

产生于世界无产阶级革命与民族民主革命运动风起云涌的年代的中国现代文学，一开始就具有重要的世界性意义。正像我国的古典文学曾对世界文学的总体构成产生过重大影响并作出巨大贡献一样，我国的现代文学也是世界现代文学总体构成中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这不仅表现为它曾经以“拿来主义”的态度接受过马克思主义与其他外来思潮、理论和文学样式，同时还表现为它以辉煌的文学成就向全世界宣告了一个东方古老民族在文化上的新生。以鲁迅创造的阿Q这一不朽艺术典型为代表的中国新文学进入世界文学的宝库，形象而生动地向全世界介绍了近半个世纪以来中华民族觉醒和斗争的过程，从而引起了国外学术界的注意和研究。

早在本世纪20年代初，日本首先出版了大西齐、共田浩编译的《文学革命与白话诗》，选择了胡适、蔡元培、康白情、俞平伯、周作人等人的作品。桥川时雄也在同一时期译出了胡适的《五十年来中国的文学》。1925年春，华侨梁社乾与被称作“春燕第一只”的俄国人Б.А.瓦西里耶夫（华名王希礼）先后将《阿Q正传》译成英文和俄文（俄译本1929年在列宁格勒出版），1926年《阿Q正传》由敬隐渔译成法文在《欧罗巴》文艺杂志上的连载，并受到罗曼·罗兰的赞扬。这些史实，大概应是中国现代文学最早获得世界印象的开端。30年代开始，在华的美国友人史沫特莱、斯诺等

人在向国外介绍中国革命斗争的同时，也介绍了中国的新文学。在日本，30年代中期也有以东京帝国大学文学部毕业生为主干的年轻人组织了“中国文学研究会”（成员有竹内好、增田涉、松枝茂夫、冈崎俊夫等人，后来又增加了非东京大学出身的实藤惠秀），他们怀着对中国现代作家与作品的强烈兴趣，不顾当时日本军国主义的压力，出版了专业研究刊物，系统地介绍翻译中国现代文学，促进了中日文学的交流。还值得一提的是，鲁迅逝世的第二年，日本改造社组织力量，翻译出版了七大卷《大鲁迅全集》，这套全集被海外学者称之为“中国现代文学被译介的一大里程碑”。40年代以后，包括苏联在内的外国汉学家更多地把注意力集中在中国现代文学的介绍和研究上，开始形成一个世界性的潮流。这里有一个我们过去所忽略的现象，一些在中国传教办学的西欧天主教神职人员，如明兴礼（Jean Monsterleet）、布里埃（O. Brière）、文宝峰（P. Henti Van Boven）、善秉仁（Joseph Schyns）等人，从这个年代开始，也陆续向西方介绍中国现代文学。在这些介绍中包括作家作品介绍、评论及文学批评史等项，既有专著又有专论，这类研究论著，都应该被我们看作外国学者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先声。

到了50年代，随着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及我国国际地位的不断增强，东西方学者越来越关注于“中国学”的研究。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也作为“中国学”的分支而发展起来，逐渐形成一门独立的研究学科。有研究就有流派。在五、六十年代，西方曾一度出现过适应帝国主义反华需要而产生的“反共派”的一些研究著作，这些著作除了在“系统性”这一点上作出过一些开创性的工作外，其反共的政治观点和西方的军事趣味都严重影响了研究的科学性。如夏志清（C. T. Hsia）的《现代中国小说史》（1961年）米尔·戈德曼（Merle Goldman）的《共产党中国持不同政见的文学》（1967年）等。与这一派遥相对立的是捷克普实克（Jaroslav Prusěk）所开创的“布拉格学派”，他们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上，作

了许多丰富的有建设性的研究工作,这批汉学家中有些人曾来过中国,与中国作家有所交往,如普实克和鲁迅、加立克(Marien Gólik)和茅盾等人都有过直接的联系。在研究中,他们重视资料考据,着重研究中国现代文学的起源与传统文学的关系,为之钩沉史料,探根溯源,在学术上作出了很有价值的贡献。

到了60年代末期,西方的反共浪潮濒于没落,随着西方政治意识的变化,继而兴起的是一大批自由主义的“中国学家”,他们从更广泛的领域探讨了中国现代文学与中国社会、中国革命的关系,也发表了一些精湛的艺术见解。这些学者虽然也受到各种西方思想的局限,持有自己的思想观点和美学观念,但不象那些直接或间接为帝国主义战争政策效劳的反共学者那样持有强烈的政治偏见或阶级成见,他们愿意根据中国现代文学的本来面貌去理解它,评价它,对于“五四”新文学的反帝反封建性质和反对国民党政权的倾向,也大都抱有理解或同情的态度,如福克玛(Douwe W. Fokkema)的《中国文学理论和苏联的影响》(1965年)、麦克道格尔(Bonnie S. McDougall)的《西方文学理论在中国的引进》(1970年)、李欧梵(Leo O.F. Lee)的《中国现代作家浪漫的一代》(1973年)等专著,就属于这一类著作。

近几年,西方对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又出现了新的趋势。一批西方学者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流左翼文艺运动和社会主义文学持肯定和同情的态度,他们力图了解我国革命时期和进入社会主义时期以来的文学情况,而且力图探索中国作家和理论家自己怎样看待文学在中国社会的地位和作用的问题,他们以同情的态度研究中国的左翼文学运动,研究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并通过这种研究来理解中国人民和中国革命。如匹克维茨(Paul G. Pickwicz)的瞿秋白研究,伯宁豪生(T. Berninghausen)的茅盾研究,梅仪慈(Y. T. Mei Feuerwerker)的丁玲研究,奥尔加·朗(Olga Lang)的巴金研究等,都具有这种特点。还有可注意的一点是,在

我们研究领域中的一些缺门或我们不够重视的领域，他们也花了力气进行研究，如关于我国一、二十年代的鸳鸯蝴蝶派文学，中国现代文学与传统文学、近代文学的渊源关系，中国抗日战争时期的沦陷区文学，中国民间文艺与通俗小说的发展等类专题，都有专著或专论出现。由此我们可以看到，国外对现代文学的研究工作在不断的发展和前进，不仅研究领域在不断扩展，而且研究工作本身也越来越接近研究的本体。这些研究成果都应该受到我国国内学术界的注意和重视。对我国现代文学研究专业工作者来说，它们开阔了我们的眼界，使我们认识到对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正成为一种国际性的事业，也形成了学术思潮和流派。它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国现代文学对世界现代文学所产生的影响力量，它的历史的国际的地位。

这里应该补叙一笔的是，国外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中，也从我们开国前后时期曾出现过一种不正常的趋势，那就是有一些现代的外国汉学家，尤其在苏联和日本，或因为和我们在思想上或政治上较为密切或接近的缘故，或由于地理环境的传统影响，他们的研究工作，往往出现一种以中国的理论动向为判断标准的情况，他们的出发点是以国际的和中国国内的政治风云（尤其是文化界的斗争）的变化而定调，往往受制于中国文学界的“左”的思潮和政策的影响，自觉不自觉地模糊了中国现代文学的真实面貌，失去了实事求是的治学原则。这些研究者的工作缺乏稳定性与一贯性，表现出大起大落的态势。这点，尤其在苏联表现得最为明显，以 50 年代中期前后为分期，他们对中国现代文学的一般研究态度和论点，往往前后判若两极，这当然是和他们机械理解文学和政治关系的传统观点的内伸性分不开的。日本也有一些学者，因为中国国内政治气候的变化，而使他们的理论观点陷于自相矛盾的尴尬境地。凡此，都是值得我们注意和深思的教训。

本丛书主要是以介绍国外——包括西方和日本、苏联在内的近十多年来的中国现代文学研究成果为主，也适当介绍一些三、四十年代早期论著，既摘要翻译国外有关中国现代文学研究的论文，也介绍一批政治上没有反共反华偏见，学术上有一定参考价值的研究专著，或选译一些专著的重要章节，供国内研究者学习参考，目的是打开一个学术研究领域的新窗户，开阔我们的学术视野。

国外学者研究中国文学，与我们给在本国研究中国文学相比，有着不同的角度与方法、理解与认识。一般说来，由于他们有着一一般西方文学或本国文学的传统素养以及作者自己的社会实践，他们在研究中国现代文学时，比较注意中西方文学的比较研究，或本国文学与中国文学的比较研究。换言之，他们一般总是以先入为主的西方文学或本国文学的眼光，来认识和评价中国现代文学。且不说那些专门研究中国文学与外来影响的专著专论，即使是一般中国文学的研究，也常常自然地注意到与西方文学或本国文学的比较。这无论在方法上或角度上，以至材料运用上，都能多少给我们以一定的启发和借鉴。

当然，隔岸观花，终究也有些朦胧。国外研究者对中国现状和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不容易看得清楚了，有些论述也比较偏执，甚至不可避免地发生谬误，这都是情理之常，不足为异；同时，有些外国学者，尤其是西方学者，多少持有一种片面见解，即过分夸大了我国“五四”新文学发展中的外来影响因素，有的甚至牵强附会，把中国现代文学视为西方文学的翻版，或是把中国的革命文学视为苏联文学的分支。这些现象，虽然有时是难以避免的，但理应引起我们的注意。当然，有的国外研究者也企图以自己的真诚努力来弥补这个“天然”的缺陷。如“布拉格学派”的创始者普实克和他的男女学生们，在这方面就作了很有益的工作和建树，他们把中国现代文学看成是整个中国文学发展的一个环节，强调在透彻理解中国文学的总体发展趋势中来理解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和变化，

这样就可避免某些外国学者在观察和研究中的主观片面性。

在翻译过程中,我们一方面力图保持它的原貌,予以忠实的翻译,另一方面对于他们的论著中所根据或引用的史实、资料以及为建立他们自己的论点而引用的我国作家和理论家的著作,都作了核实。对于明显的错误史实,予以注明校正;对于引文中的不确切之处,除在译文中依照原文加以移译外,并由译者以注释的形式,录用正确的引文,以示对照。他们的论点是建立在对原始资料的理解和翻译上面的,如果引文不实,关系到论点的建立和科学性。所以对于国外研究者的论著中这类失误之处,我们有责任和权利予以校正,以免以讹传讹,流播宇内。实际说来,这也是对原作者一种有益的支援和帮助,是另一种形式的交流和友谊的表现。

伟大的鲁迅生前曾感叹说:“在中国的外人,译经书、子书的是有的,但很少有认真地将现在的文化生活——无论高低,总还是文化生活——介绍给世界……。”(见《〈奔流〉编校后记》)这样的时代已成为历史而过去了,中国现代文学如今已成为国外汉学研究中的一门独立学科,形成一支人数不断加多的专业队伍,这就给我们新时期的中国现代文学的研究者加重了任务,要求我们要更熟练地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立场、观点和方法,立足于我国的历史和现实,吸取外人的研究成果,博采众花,以酿己蜜,使这门学科的研究工作更快地繁荣起来,发达起来。这也就是我们不揣浅陋,编译《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的一点由来。我们愿以此就教于海内外贤达,以求把这个工作做的更像样一些。

1985年12月5日于复旦大学

目 录

序言:博采众花 以酿己蜜	贾植芳(1)
日本文学思潮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	〔美〕郑清茂(1)
西方文学思潮对中国现代文学的影响	〔澳〕B.S.麦克道格尔(32)
浪漫主义思潮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	〔美〕L.李欧梵(66)
被压迫民族文学形象和中国现代文学	〔犹〕艾琳·埃伯(107)
论一、二 十年代传统样式的都市通俗小说	〔美〕佩瑞·林克(120)
从中国的文学革命看传统的东方文学与 欧洲现代文学的冲突	〔捷〕普实克(145)
鲁迅与马克思主义文艺	〔日〕山田敬三(157)
瞿秋白对“五四”一代的批评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批评	〔美〕P.G.匹柯维茨(184)
苏联的鲁迅研究概述	〔美〕J.艾尔伯(208)
老舍及其创作	〔苏〕费多连柯(224)

《战争年代的老舍创作(1937—1949)》序	
.....	〔苏〕O.П.博洛京娜(240)
郁达夫:传统文学与现代文学的过渡	
.....	〔加〕米切尔·伊根(245)
中国现代文学的主潮	 〔法〕奥·布里埃(262)
后记	 陈思和(283)

日本文学思潮 对中国现代作家的影响*

〔美〕 郑清茂

“中国文坛大半是日本留学生建筑成的”，郭沫若曾泰然自若地宣称。他解释说：一些重要的文学社团的主要作家，都是日本留学生。此外有些从欧美回来的慧星和国内奋起的新人，但他们的努力和建树总不及留日出身的作家们来得浩大，而且他们仍然多是受了前者的影响的。“就因为这样的缘故”，郭氏下结论说：“中国的新文学是深受了日本的洗礼的。”^①统计资料证明了他的论点。在 20 至 30 年代活动有影响的大多数中国作家都是留日学生。^②

由于在中日战争(1894—1895 年)中的可耻败北，中国被迫承认早昔被它当作自己忠实的文化上的弟子的日本已经变成了一个先进国家。从 1896 年开始，中国学生被派到日本学习。这个决心起始于一种不愉快的需要性，它植根于一种以日本为榜样中国可以使自己现代化的希望。随着时间的推移，尤其是日俄战争(1904—1905 年)以后，日本从明治维新(1868 年)以来在现代化事业上的卓越成功，给了许多中国人以深刻的印象。甚至有些人坚持和日本在语言和种族上的一致性(同文同种)这种荒谬的观念，把日

* 本文译自米尔·雷德曼的《五四时代的中国现代文学》(Merle Goldman, ed., *Modern Chinese Literature in the May Fourth Era*), 哈佛大学出版社 1977 年出版原题为: “The Impact of Japanese Literary Trends on Modern Chinese Writers”。

本的成功的光荣当成他们自己取得的東西。因为找到了中国遭受失败而日本却能够获得巨大的成功的原因，一批一批的官费（中央或地方政府的）和私费的中国学生到了日本。在1906—1907年这一学年，估计他们为数超过万人。^③

对于中国人的学习热忱，日本人也正以卖力施教作为回敬。但是绝大多数到来的中国学生却把许多日本人给弄糊涂了，而且暗地里损害了他们施教的努力和他们按理应该做到的事情。在1920年11月出版的有名的《太阳》杂志上，一位出名的“文化评论家”挖苦地说：“日本人窃得了西方文化，自以为了不起了，而且在中日战争和义和团事件（1900年）以后，越发自视甚高了起来，今日竟然以中国人的导师自居。”^④他所说的“西方文化”，就正是中国人最需要从日本学习的东西——自然是第二手的；此外就再没有什么可以学的了。对大多数中国人说来，“西方文化”里头莫过于实用的学问、工艺、技术对他们的国家更有用处的了：军事战术、机械、医药、政治、经济以及教育。这并不奇怪，几乎全部中国留学生，甚至那些后来在新文学运动中的头面人物，绝大多数学的是这些实际性学科——有的是自己选择的，有的是遵从政府指示的。

为什么有那么多的留日学生后来倾倒在文学？大多数现代中国作家，象鲁迅、周作人、郁达夫和郭沫若，当他们还在日本大学里学习别样专业的时候，就已经卷入了文学活动。这里引一段鲁迅在自传里的陈述，来解释这个不寻常的现象：

“但待到东京的预备学校毕业，我已经决定要学医了，原因之一是因为我确知道了新的医学对于日本维新有很大的助力。我于是进了仙台医学专门学校，学了两年。这时正值俄日战争，我偶然在电影上看见一个中国人因做侦探而将被斩，因此又觉得在中国还应该首先提倡新文艺。”^⑤

看过新闻短片以后，他说，他便觉得医学并非一件紧要事，因

为凡是愚弱的国家里的人民,即使体格如何健全,如何茁壮,也只能做毫无意义的示众的材料和看客。鲁迅下结论说,中国的第一要着,是在改变人民的精神,“而善于改变精神的是……文艺”^⑥。鲁迅生活中这种有名的从医学到文学的转变,概括了许多放弃了原来的专业而从事文学的中国学生的经验,因为他们最关心的是他们的人民“精神的改变”。

文学能够“改变精神”的观点,在中国并不新奇。中国的传统,尤其是孔子的教条,把文学当做道德教化的重要传送工具,已经源远流长,对官吏和知识分子说来,则是他们为国效力时责无旁贷的职责所在。在这方面,有曹丕(187—226年)的论文《典论·论文》中的一段名言可为例证:“盖文章,经国之大业,不朽之盛事。”^⑦中国现代知识分子看到了在日本和西方国家里,文学在促进社会和政治改革中的功用。为此,他们恢复了中国古代关于文学的重大作用的观点,而且重新加以强调。他们所注意的焦点不是放在中国最受重视的两种传统文学样式诗和散文上面,这种重新泛起的文学兴趣则在于热心提倡小说。而小说,因为它的广大读者是在被世俗看不起的民间社会里,曾经长期地遭到轻蔑。

负责发起这场变革的第一个人,就是梁启超,而形成他对小说的看法的是日本明治时代的文学思潮。梁启超从1898年维新失败直至1912年民国建立,都亡命在日本,在五四运动(1919年)以前那两个十年之间,他经常思考着最有认识影响的力量。在亡命之前,他在黄遵宪的影响之下,任《时务报》主编,黄遵宪的《日本国志》(1890年),对于改变中国人对日本的态度,或者可以说是关系最为重大。梁启超早在《时务报》时期就觉察到“日本之变法赖俚歌与小说之力,盖以悦童子,以导愚氓,未有善于是者也”^⑧。当1898年他亡命到日本后,他立即着手于办《清议报》,其后,在1902年又主办《新民丛报》和《新小说》,继续他的中国启蒙运动。他到日本仅仅两个月以后,就在《清议报》的创刊号(1898年10月)上

写道：

“政治小说之体，自泰西人始也。……在昔欧洲各国变革之始，其魁儒硕学，仁人志士，往往以其身之所经历，及胸中所怀，政治之议论，一寄之于小说。于是彼中缀学之子，黉塾之暇，乎之口之，下而兵丁、而市伶、而农民、而工匠、而车夫马卒、而妇女、而童孺、靡不手之口之。往往每一书出，而全国议论为之一变。彼美、英、德、法、奥、意、日本各国政界之日进，则政治小说为‘助’最高焉。英名士某君曰：‘小说为国民之魂’。岂不然哉！”

梁启超于是清楚地说明他在《清议报》上译载外国政治小说的计划，是“而有关切于今日中国之时局者”，这样，“爱国之士，或庶览焉。”^⑨

梁启超不只是说说而已，他翻译了东海散士（1852—1922年）的政治小说《佳人奇遇》在《清议报》创刊号上开始登载，连载了35期。他不过是刚开始学习日文，但是他的译文受到某些日本人的称赞，说是“美妙非常，甚至佳于原著。”^⑩接着，另一部著名的日本政治小说矢野龙溪（1850—1931年）以古希腊底比斯人英勇而成功地抵抗斯巴达入侵为题材的《经国美谈》，不加署名的被翻译连载。梁启超显然并不满足于翻译一途，他还写了几种小说和戏剧，其中最著称的是《新中国未来记》（1902年）。这部作品显然是从日本的“未来记”（像末广铁肠的《二十三年未来记》之类）得到灵感的。

梁启超的耽迷于小说，尤其政治小说，促使他在1902年出版另一个杂志《新小说》。经过4年来密切观察日本文学界和具备了某种程度的阅读日文的能力，他在新杂志创刊号的发刊词上宣称：“小说为文学之最上乘也，”并且号召“小说界革命”。认为如果中国要改革民众教育，欲新道德、新宗教、新政治、新风俗、新学艺、乃至新人心、新人格，必新其小说。何以故，“小说有不可思议之力支

配人道故。”^⑪

虽然在外国亡命十载有余，梁启超的影响却遍及中国——不仅在通都大邑，而且远及内地的穷乡僻壤。几乎所有继起的一代的政治和文化上的领导人物，都感激地承认，他们感谢梁启超对他们在知识上的促进作用，他们正是通过阅读私下进入中国的他在海外办的出版物而得到很大的启发。^⑫

梁启超对于现代中国发展的贡献，实在大于目下的一般评价。钱玄同确切地称他为“创造新文学之一人”，并且赞扬他那种非凡的眼力：“然输入日本文之句法，以新名词及俗语入文，视戏曲小说与论记之文平等。”^⑬周作人同意钱玄同称道梁启超在中日文学关系上的贡献的意见：

“讲到近来新小说的发达，与日本比较，可以看出几处异同，……中国以前作小说，本也是一种‘下劣贱业’、向来没人看重。到了庚子——19世纪的末一年——以后，《清议》《新民》各报出来，梁任公才讲起《小说与群治之关系》，随后刊行《新小说》，这可算是一大改革运动，恰与明治初年的情形相似。”^⑭

另一位看出梁启超在中国现代小说形成中的地位的是增田涉，这位可以说是对于现代中国文学史最有识见的日本学者。他说：“说‘文学革命’是‘小说界革命’的1917年版本毫不过份。”^⑮

的确，梁启超应该得到这样的称赞。他作为一个新闻家、教育家和改革家对于现代中国的贡献及其对于后来的影响，可以和日本明治时代第一个和最杰出的提倡“文明开化”的福泽谕吉（1834——1901年）相媲美，但他不同于福泽谕吉之处，是他非常注重政治小说的功利性。在第69期的《清议报》上，它的社论栏（可能是梁启超撰写的）宣称，迄今为止，在该刊上登载的《经国美谈》《佳人奇遇》这类小说是“中国政治小说之先声。”或者可以同样地说，《新小说》是中国小说杂志的先驱者。1902年在日本横滨发刊后，它

不仅刊登了许多值得注目的作品,而且为同类性质的杂志不久在中国一个接一个地出现树立了榜样,如《绣象小说》(1903年)、《月月小说》(1906年)、《小说林》(1907年),都向着《新小说》所建立的一个共同目标努力,这些杂志都刊登了大量的政治和社会小说,或者如鲁迅所称的“谴责小说”^⑧。这使人联想到在日本江户时代后期和明治时代早期的“劝善惩恶小说”这一类似的现象。

日本政治小说最盛时期一般说来是1880年到1890年之间。首先,它被看作明治早期的一种自由民权运动的表现。日本朝野间的许多有识之士企图在小说中表示他们的社会政治观点,作为一种启迪国民和影响政府态度和政策的手段。其次,政治小说的盛行,也是明治维新以来大量翻译和改写西方文学作品的结果。这个时期最流行的西方作家是汤姆斯·摩尔爵士、莎士比亚、鲍烈威·李顿(Edward George Bulwer-Lytton)^⑨;小仲马、雨果和凡尔纳^⑩以及俄国的虚无主义者。从严格的意义上说来,在这些作家中的少数才是政治小说家^⑪,但是他们的作品却经常地给起了个政治气味十足的译题。莎士比亚的《裘力斯·凯撒》的一个译本,被题名为《该撒奇谈:自由大刀余波锐锋》,小仲马的《一个内科医生的回忆》被题名为《佛国革命起源:西洋血潮小风暴》;凡尔纳的《马丁·鲍斯》得到了一个激动性的新题名《政治小说:美人血泪》。

当梁启超1898年抵达日本的时候,日本政治小说的高峰已经过去了几近10年。青年一代正在试验各式各样新进口的文学理论和样式,被称为现代日本小说的理论缔造者的坪内逍遥(1859—1935年)在1885年出版了他的有影响的著作《小说神髓》,某种程度地抵制了流行的政治小说。他反对功利主义观点,倡导文学的自主性和现实主义。两年以后,日本第一部西方现实主义形式的小说,二叶亭四迷(1864—1909年)的《浮云》出版了。之后,许多西方的文学思想、技巧和形式——浪漫主义、新浪漫主义、自然主